

明清井陘道的交通建设及其影响

郝平 张玮

【摘要】交通建设是传统时期山区社会形塑的重要方式。井陘道作为“太行八陉”之一,明清时代交通地位不断提升,交通建设迅速发展:沿河谷分布的主干线路逐渐完善,形成了“五横十纵”的路网体系;沿驿道设置的交通机构不断健全,形成了有层级、分职能的组织体系;区域的交通秩序基本理顺,朝规范化发展。在自然与社会各要素的综合影响下,以陉道为空间载体的华北山区腹地型交通功能区也由此形成。

【关键词】明清时期;井陘道;交通建设;社会形塑

【作者简介】郝平(1968-),男,历史学博士,教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史、历史地理学;张玮(1992-),男,历史学博士,讲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史(山西太原030006)。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24.1.53~6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太行山传统村落文献的抢救性保护与数字化整理研究”(23VJXT020)。

太行山地处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地带,具有天然的交通枢纽属性。山河相间的地形特点使其主干通道多辟于山脊断口或横谷之间,被称为“陉道”。^①井陘道即其中一条横亘于太行山脉中段的交通孔道,因地形“四面高,中央下,如井”^②得名,道路“乍阔乍狭,阔仅可方轨,狭才容车”^③,此外太行山“并无通车路之处”。^④因此,井陘道向来是太行山东西两麓之间的“最主要大道”。^⑤明代迁都北京以降,太行山交通地位持续提升,井陘道也由明朝时期的京晋官道及西陉贡道发展为清朝时期的京陕官道^⑥,沿线交通建设迅速发展。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时期太行山交通研究已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交通线路、交通特点、交通功能等方面^⑦,但对交通建设方面的关注较少,且多将其视作一种“技术史范式”^⑧,学理层面仍有相当的深化空间。^⑨正如周大鸣等学者指出的,道路不仅仅作为基础设施和物质,还是一种兼具实践性、社会性、开放性和移动性的特殊空间与区域。^⑩道路交通建设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与社会共同作用下的

区域形塑历程,具有明显的社会结构性。对明清时期太行山陉道交通建设的系统分析,有利于拓展太行山历史交通地理、区域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井陘道为个案,基于历史地理学与区域社会史的互动视角,对明清时期太行山陉道交通建设内容开展专题研究,通过探讨其在交通线路、交通机构与交通秩序等方面的发展特点,进而揭示明清以来太行山区腹地型交通社会的形成过程。

一、井陘道交通线路的完善

道路是自然与社会互动下的直接产物,连绵不断的山脉走势限定了井陘道的交通走向,“自获鹿至王胡集,凡四百一十五里,经州县三城、井陉一关,道皆行山中”^⑪;横跨数县的建置区划塑造了井陘道的社会空间,“自平定至获鹿二百余里,皆古所谓井陘道也”^⑫,即本文探讨的区域范围。

历史时期的井陘道深受自然条件影响:重岗叠岭、水峡环奇的地理环境决定其沿“多东西横亘”^⑬的沟谷、河流这种天然通道铺设,形成了“东西为主、南北为辅”的路网格局;万山牙错、曲水深洄的地貌特

征,造就其错综纷歧的路径。明清以来,在井陘道区域聚落发展^⑪、移民运动、工程建设等一系列社会因素推动下,陘道交通线路逐步走向完善。由于明清时期井陘县城是各条干路的交汇点,故以其为中心,分作东西两路详述(参见图1)。

(一)干道线路的优化

井陘道东路干道有两条,分为北段与南段。

东路北段主要沿山岭分布,东起获鹿县土门关,沿西北山谷,历白鹿泉、胡神入井陘县界;过平望庄、柳树坪、五里寺,抵威州镇;沿西南而下,途经南沟、固底,过青石岭,历赵村、冯家沟、天户镇、岗头、横涧、青泉,跨油糕岭与凤凰岭;南下石桥头、水子村,抵井陘县治。该段曾长期作为官道,汉时于天户建五陘城;元时于威州设州治所,路“当山东西通道,贤卿大夫之使往来必少留”^⑫;金元以来“为山右、关中

诸省觐京通衢”^⑬，“巴蜀之人或仕宦、或朝贡、或商贾以至京师者，奚经于此”。^⑭万历四十六年(1618),井陘知县罗懋汤将官道“改北而南”^⑮后,其成为民间一条重要的“商旅之孔道”。^⑯

东路南段部分沿冶河分布:东起获鹿土门关,向西行十里入井陘县境,翻过亮字岭陡崖石坡,历下安、上安、王家庄;越过白石岭东天门,经五里铺、微水镇;再跨冶河,经长岗、石圪塔、横口、张村;越绵河,历郝家西河、三家店、东窑岭、梁家凹、河东坡,抵井陘县治。该段自万历四十六年后承接了官道功能,并在清代成为国家官马西路的重要路段,号称“六省道衢”^⑰，“西域之纳贡京师者，相属于道；而燕赵秦晋之客东西行者，亦络绎不绝矣”。^⑱

综合来看,井陘东路干道的线路拓展,主要源于沿线聚落的大量增加。该段途经区域开发历史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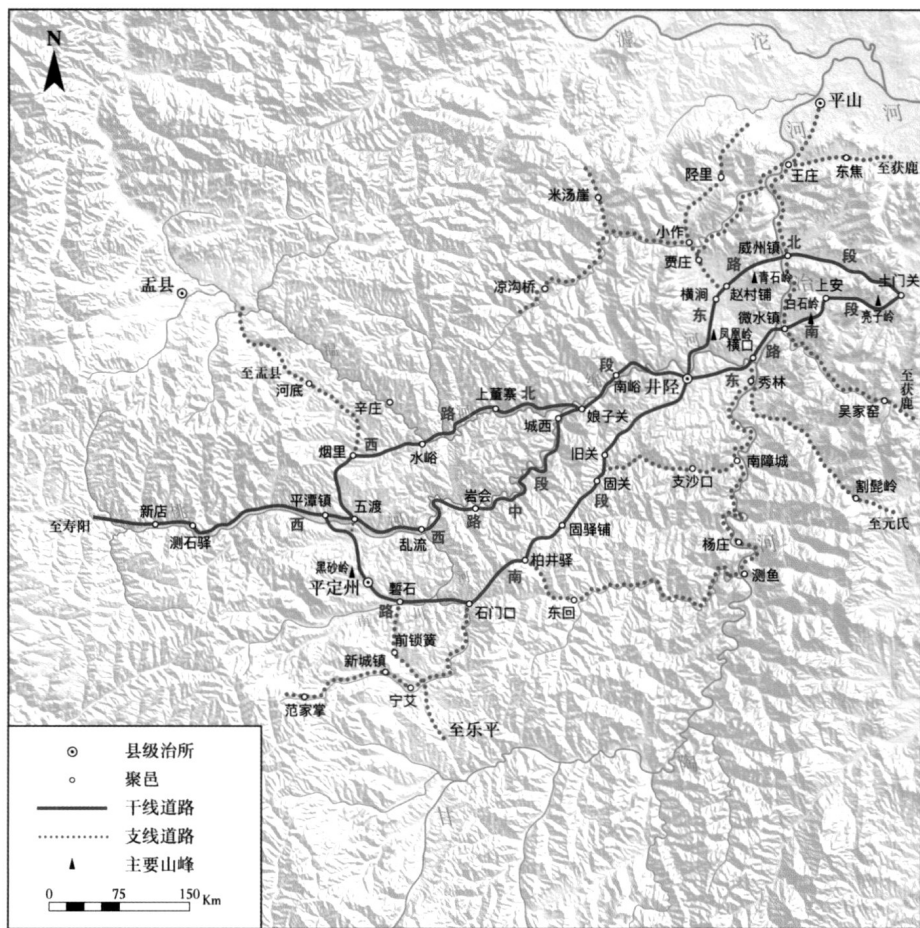


图1 明清时期井陘道交通线路

说明:据 SRTM 90m DEM(<https://srtm.csi.cgiar.org>)数据绘制。

久,沿线聚落形成时间较早,在清代出现了普遍的分化现象。如北段胡神演化为东西二村,平望与固底分成南北二庄,赵村新增北赵、中赵、南赵三地,横涧扩展为横北、横中、横南三街与横西、横东、北西、西西四邑。^②南段则相继有上安西、上安东、南横口、北横口、南张、北张等村出现。诸多分化而成的新生聚落,推动了胫道线路的空间拓展。

井胫道西路干道有三条,分为北段、中段与南段。

西路北段主要沿绵河与温河分布:东起井陘县治,向西经教场、蔡庄,跨绵河至乏驴岭;经百花栈道,顺绵河至南峪,抵平定州娘子关界;沿温河西行,经地都、镇里、娘子关城、坡底、下董寨、上董寨、会里、河东、拒城、圪套、水峪;折向西北,历赵家园、柴家庄、南庄、辛庄抵盂县境。该段“襟山带河,地势据形胜之险途,道路崎岖,往东通秦晋之道,巉巖叠耸”^③,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汉时筑董卓垒、北魏置苇泽关、隋置苇泽县、唐建承天军城^④，“实汉唐以来名将巨帅往往屯扎驻防于此，诚要害之区也”。^⑤嘉靖二十一年(1542)朝廷置娘子关城守于此，成为“捍卫王畿之要路”^⑥，“西晋之孔道，接忻代之通衢”^⑦，该段线路的走向也从昔时苇泽关所在的温河北岸转移至娘子关所在的河道南段，并逐渐发展成“道途达燕赵往来之通衢，关路通山陕西北之孔道”^⑧，原路口则被称为“古道口”。^⑨可见，该段线路的变化与国家关防布局的调整紧密相关。入清以后，随着草原边患消除，该段成为晋北、西北商人^⑩来往张家口、京师等地的重要商道；路径又多傍崖沿河，“石壁嶙峋，巨河奔注，自西而东，远方商贾常往来于斯”^⑪，狭仄崎岖，大车难行，以驮运为主，是井陘西部一条主要的岩崖驮道。

西路中段主要沿桃河分布：东起娘子关，沿桃河，历城西、东塔堰、西塔堰、程家庄、东武庄、西武庄、下盘石、上盘石、岩会、移穰、龙庄、乱流，向西经白羊墅、圪台、王珑、河坡、石家庄，过五渡后并入南段。该段地处桃河河谷，地形开阔，桃河常年不冰，尤便于长途行军，因而此路成为“历代行师要冲”^⑫，后唐李存勖伐晋获白鸡祥瑞即于此途中。^⑬中古时期该道重要性已位居井陘西部诸路之首。^⑭宋代以后，随着南段交通的发展，该段地位逐渐下降，于明

清成为胫道西部一条重要的民间沿河驮道，为“燕代通途，南北往来者甚伙”。^⑮明清时期该段线路的调整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桃河旧称“桃江”，径流量大，每逢汛期更是浊流激荡，“居民恒受其警”。^⑯受此影响，该段线路主要设于沿河岸的台地之上。明清以来桃河水位不断降低，逐渐形成连片滩地，成为新的通道空间。如程家庄建于桃河北岸之山麓，创修于明朝的村西观音阁与村东晋阳阁之间的乡道向为干道。^⑰清朝山脚大片滩地出现，乡民开辟为“天人路”，四方商旅来往络绎，至道光时期该地已设有至少18家商号。^⑱

西路南段主要沿山沟分布：东起井陘县治，出南关，沿西南历潭洞、朱家疃、板桥、长生口、龙窝、核桃园，抵平定州界旧关；西经甘桃驿、固关、槐树铺、固驿铺、柏木井、柏井驿、桥头、小桥铺、石门口、西郊、磐石、东关，抵平定州城；出西关，越黑砂岭南天门，历义东沟、义井、阳泉；北跨桃河，经平潭镇、西河、石卜咀、赛鱼、新兴、坡头、测石驿、旧街、新店出州境，抵寿阳境。该段为汉韩信伐赵故道^⑲，坐落群山深谷之中，复壑连崖，路径逼仄，“乘者不得安舆，骑者不得徐驰”^⑳，通行条件历来差于中线。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徙平定县治于现址后，该段成为官道，得到不断修治，“道京师而来，历汾晋，接秦陇，走云代，商旅络绎，使驿旁午，车催马括”。^㉑明于此设置固关，成为“扼要重地，神京门户，乃封疆之咽喉”。^㉒清时其更被定为“大驿”，与东路南段衔接，成为“神京大道”^㉓，“凡皇华使臣、军书邮递皆由焉”^㉔，而“西秦巴蜀及新疆海隅之地，来享献王者，莫不取道于兹”。^㉕明清时期该段线路的调整，多以官府局部修治优化为主。如光绪十年(1884)晋省重修驿道时，“东天门既将旧路石工重修完整，因地势过于斗峻，行旅畏沮，另于东南山麓开创新道七里有余，高下听民所由……义井至测石驿一段，滩路纡迴，涉水者凡十二处，夏秋亦苦山水之患，令于平潭、石坝嘴、墩台山三处创筑石隄二里，内则因山开道，外则筑坝护堤”。^㉖

(二)支路网络的拓展

井胫道支路由干路节点分支延伸，多为县域之间的通道。井胫道东路支路主要包括北向、西北向、

东北向、东南向、南向等五路,分述如下。

北支路有二:其一,由井陘县治始,沿东路北干道至冯家沟,北历南寨、北寨、贾庄;转向东北,经石门、库隆峰、高家庄、防口、乐阳;向东跨过冶河,至王家庄,折向东北入平山县境。其二,由贾庄分支向西北,经小枣、赵庄岭、小寨、康庄村、陘里、杨清村;向北里许至平山县境。上述路段明代便已成为井陘县至平山县的主要通道。^⑦

西北支路有二:其一,由小枣村南向西北,经郝家庄、贾家庄、大王庙,至菩萨崖后折向西北;经黑水坪、米汤崖至平山县境。该段深处山区腹地,线路走向取决于聚落布局。该段沿线聚落除大王庙、菩萨崖分别形成于万历和道光时期外,其余均出现于洪武时期。^⑧可见该段在明初即成型。其二,由菩萨崖折向西南,经栾家村、新庄、洪河槽、良沟桥至孟县境。该段走向受河流影响,沿今小作河分布,沿线聚落普遍形成于明中后期。^⑨该路在清代成为井陘县“通山西僻路”。^⑩

东北支路有二:其一,由微水分支,东经岩峰,北越北岭,经段庄、南沟、威州镇、坡头、公元、东元、孙庄,至王庄后并入北向支路。其二,由北向支路沿冶河,南折西焦而东,经东焦至获鹿、平山两县境。上述路段位于井陘道三大川地之一的威州川,沿线聚落历史悠久,交通线路成型于明代之前。^⑪

东南支路由微水分支向东南,沿金良河,经新庄、良都、良河西、良店、东庄、卜村、窦王墓、吴家窑、金柱、苗峪,至获鹿县境。该段为明清时期井陘县通往获鹿县的东南主路,北段路线成型较早。明清以来良河西、良店、东庄、窦王墓、吴家窑、苗峪等聚落陆续形成,南段路线也随之完善。^⑫

南支路有三:其一,从横口东跨越绵河,沿冶河经北秀林、南秀林、柏山、孙家峪、北障城、南障城、七狮沟、柿庄、孤台、耿庄、杨庄,入平定州界。该段沿线聚落集中形成于元末,线路也成型于此时。^⑬其二,由南障城分折向西,经流砂棚、支沙口、蒋家、吕家,沿平定州小梁江、大梁江、王家岭至平定州界。该段形成于明清时期,沿线多为典型的移民聚落,吕家、小梁江、大梁江形成于明中后期;流砂棚、支沙口、蒋家则形成于清前期。^⑭其三,从秀林之南,跨越

甘陶河,由梅庄村向东南入芦王川,沿割髭河,经张家庄、河应、塔寺坪、塔寺坡、王庄、北芦庄、南芦庄、割髭岭,越岭入元氏县界。该段为明清时期井陘县至元氏县的主要通道。

井陘道西路支路主要包括北向、东北向、南向、西南向、东南向等五路纵向分支。

北支路由平定州城起,北过黑砂岭,历义井,跨桃河;经五渡、桃坡、甄家庄、桑堰、三泉、烟里、南窑庄、千亩坪、杨树沟、三郊、三都、苇泊;后折向西北,经河底镇入孟县境。该段地处盆地,为明清时期平定州通往孟县的主要通道,路途平坦,兴盛于清代,设有铺路^⑮，“北界滹沱,南通石艾,东邻获邑,西接寿阳,实系乡居日进财水必由之路,且四外客商往来所共由之路也”。^⑯从该支路与西路北段干路沿线各村,可通往义羊都、三贤都、白泉都、拒城都等聚落。^⑰

东北支路由烟里东折,经白泉、河北、水峪,抵圪套后并入干路。该段为平定州东部盆地中的主要通道,“地僻而要”^⑱,盛于明清,为“商贾所云集地也”。^⑲从该支路与西路中段干路沿线各村,可通往拒城都、移穰都、盘石都等聚落。^⑳

南支路由平定州治起,东沿干道,过暂石南折,历庄窝、东锁簧、梨林头、官道沟、张庄镇,至乐平县界。该段为明清时期平定州至乐平县主道,地势平坦,设为铺路。^㉑清中后期是该区域聚落分化的显著阶段,如梨林头分化为前梨林头与里梨林头二村,东锁簧分化出马家锁簧与前锁簧二村,路线最终定型。从该支路与西路南段干路沿线各村,可通往东会都、隅厢都、东回都、尚艾都、赛兴都等聚落。^㉒

西南支路由干道石门口分支,向西南沿今阳胜河,历石门、立壁、下马房、上马房、宁艾、新城、阳胜,至寿阳、乐平县界。该段为汉上艾县通井陘西路南线干道石门口的重要通道,宋徙县治于榆关后渐衰。^㉓其中新城即“汉上艾县治”^㉔,沿线聚落形成较早。明清时期该段为和顺等地通固关捷径,多用于军事行动。如崇祯六年(1633),晋省农民军曾沿此路直逼固关城。^㉕从该支路沿线各村,可通往郭村都、广阳都等聚落。^㉖

东南支路由西路南段干道柏井驿分折,向东南沿山谷,经牌岭,向西历西回、东回、木槽、马山、沙果

青、营庄、七亘；越阳坡沟，经石门、杨坡、测鱼，至井陘县界。该段“四面皆崇山峻岭，东西通衢”^⑥，沿线聚落集中形成于明清。由于其可通井陘县苍岩山，随着清代苍岩圣母信仰的广泛传播，该路作为平定州民赴“苍严朝顶、进香过往”^⑦的主要香道而兴盛，沿途创建有圣母行宫。^⑧从该支路沿线村庄，可通往东回都、营测都、东郊都等聚落。^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明清时期井陘道的交通线路呈现出一定的基本规律。从线路取向来看，自然条件始终是影响陘道线路分布的基础因素，无论干路、支路，沿河流或沟谷分布是陘道线路的基本特征。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局部线路的持续优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陘道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空间布局来看，陘道区域在整体上形成了“五横十纵”的交通主干格局。而在区域内部，受地理环境空间

异质性影响，河网密集而聚落稀疏的陘道东部地区呈现出沿冶河、绵河、甘陶河等支流延展的“枝杈状”支路布局特点；沟谷纵横而聚落密集的陘道西部地区则形成了以支路沿线村庄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网络状”支路布局结构。总而言之，明清时期井陘道交通线路经过持续完善，为时人穿越太行山构建了一套通达四方的交通路网体系。

二、井陘道交通机构的健全

置邮传命是古代王朝管辖广阔疆域的重要方式。为保障邮驿的日常运转，明清时期井陘驿道上设置了诸多类型的交通机构(参见表1)。清代西北官道由河南路改走山西路，“西安、甘肃、四川者由山西路，均于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不许枉道”。^⑩井陘道的地位愈发重要，成为国家“大驿”^⑪，沿线交通机构组织也在不断调整中逐步健全。

表 1

明清井陘道主要交通机构组织一览

沿线村落	间隔	通信机构			运输机构	治安机构	
	里数〔清〕	驿站	铺站	塘站	递运所	巡司	营汛墩堡
获鹿县城	——	镇宁驿	在城铺		(鹿泉递运所)		
土门	五里		土门铺				
白鹿泉	八里						
胡神	六里		(胡神铺)				
平望	十里		(平望铺)				
固底	十里		(故递铺)				
赵村	十里		(赵村铺)				
横涧	十里		(横涧铺)				
凤山	六里		(凤山铺)				
郅家庄	——						郅家庄墩
下安	五里		下安铺				亮子岭墩
上安	五里		上安铺				
王家庄	五里		白石铺				王家庄墩
微水	十里	腰站	微水铺				微水墩
长岗	五里						长岗墩
横口	五里		横口铺	横口站			横口墩
张村	五里						
郝西河	五里		西河铺				
东窑岭	五里						
井陘县城	五里	陘山驿	在城铺		(井陘递运所)		井陘汛
南关	二里						五里铺墩
朱村	三里						
板桥	五里		板桥铺	板桥站			
长生口	五里	腰站					牛头脑铺墩

续表 1

明清井陘道主要交通机构组织一览

沿线村落	间隔	通信机构			运输机构	治安机构	
	里数〔清〕	驿站	铺站	塘站	递运所	巡司	营汛墩堡
龙窝	五里		龙窝铺				阁坡五里铺墩
核桃园	五里		界墩铺				桃园汛
旧关	十里			旧关站		(巡检司)	旧关分汛
甘桃口	二里	甘桃驿	(甘桃铺)旧关铺			巡检司	
固关	三里						固关营
槐树铺	十里		(槐树铺)大湾铺				槐树坡分汛
固驿铺	十里		(固驿铺)火龙冈铺	固驿站			固驿铺分汛
柏木井	五里						柏木井分汛
八里桥	八里						八里桥分汛
柏井	七里	柏井驿	(柏井铺)五里铺、石川会铺			巡检司	柏井分汛
桥头	十里			桥头站			桥头分汛
小桥铺	五里		小桥铺				
石门口	五里		杨家湾铺				
西郊	十里	腰站	(西郊铺)五里铺				西郊分汛
暂石	十里		(暂石铺)凤居口铺	暂石站			暂石分汛
平定州城	十里	平潭驿	在城铺		(平定递运所)		(守御千户所)平定营
义东沟	五里		腰沟铺				南天门分汛
义井	五里		(义井铺)				义井分汛
阳泉	五里		沙巷口铺				
平潭	五里		(平潭铺)	平潭站			平潭分汛
石卜咀	五里		石卜咀铺				
赛鱼	五里		(赛鱼铺)				赛鱼分汛
新兴	十里		(辛兴铺)浅水淤铺				新兴分汛
坡头	五里						坡头分汛
测石	五里	芹泉驿	(测石铺)安铺	测石站		巡检司	测石分汛
旧街	五里		旧街铺				
新店	五里		(汗桥铺)				新店分汛
镇里	——						娘子关汛

资料来源：整理自成化《山西通志》卷4《驿递》、万历《山西通志》卷24《武备上》、嘉靖《真定府志》卷11《建置》、光绪《山西通志》卷80《略七之二·公署略下·驿传》、同治《畿辅通志》卷125《兵制》、嘉靖《获鹿县志》卷3《建置》、雍正《井陘县志》卷2《建置志》、光绪《续修井陘县志》卷15《驿站》、光绪《正定县志》卷24《驿站》、民国《昔阳县志》卷2《驿铺》、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由于明清时期部分机构设置多有调整，因此表格内将明设清废的机构以括号标注区分。

(一)通信机构的调整

1. 驿站的增设

驿站专掌“邮传迎送之事”^③，明代设驿丞专管，清初改革后多为州县兼理，分水、陆两类，视道路之冲僻而设。“冲则谓之驿站，所以供皇华之使臣、朝贡之方国与赉奏之员役也；僻则谓之里甲。马仅以供本州邑之驰递，故又谓之递马。递马之设，不过数匹。驿站每州邑或再设，甚冲或三设，每站额马六十、七十不等。其廩粮工料，存留项下支销，而岁终地丁奏报焉”。^④明清驿站主要负责信息传递与迎接接待事宜。

明代井陘道共设驿站四处，分别是：陞山驿，明初置，在井陘县治东，额设马56匹。^⑤柏井驿，明初置^⑥，在平定州乐平乡北70里柏井镇^⑦，额设马55匹^⑧；平潭驿，洪武三年(1370)设^⑨，原置于平定州西20里平潭镇，万历时移置下城西关，清时移至上城榆关外。^⑩芹泉驿，洪武三年设^⑪，初隶寿阳县芹泉镇，洪武年间改由盂县借地管理。^⑫

清顺治年间，上述四驿继续沿用。其中陞山驿额设驿马86匹，站夫80名^⑬；柏井驿额设马91匹，马夫45名半；平潭驿额设马79匹，马夫39名半；芹泉驿额设马79匹，马夫39名半。^⑭雍正十年(1732)，鉴于陞山驿距离柏井驿“尤远而险”^⑮，官方在平定州东90里甘桃口处增设甘桃驿，额设马60匹，马夫30名。^⑯雍正十一年(1733)，又因寿阳新增腰站，与芹泉驿相距较近，故将其东移至平定州属之测石村，后多称“测石驿”。^⑰乾隆前期西北叛乱不断，朝廷频繁“兴师口外，差使络绎百倍于前”^⑱，井陘道驿站资源不敷办理。为确保公文正常传递，乾隆十九年(1754)朝廷下诏自京城至金川安设驿站，“内有两驿相距遥远之外，应于适中之地，添设腰站”。^⑲井陘道相继于平定州西30里西郊村^⑳、井陘县东40里微水镇与县西30里长生口等地，赁民房店宇，添设腰站三所^㉑，“不换送差之夫，亦不更领工料，但换马即行”。^㉒至此，井陘道驿站体系最终定型。

2. 急递铺的调整

急递铺也是负责文书传递的一种通信机构，“一切公文折报，皆由铺司传送，与驿站相表里”。^㉓与前者不同的是，急递铺侧重于日常公文的递送，即“重

事给驿，常事入递”^㉔，依靠各铺之间的铺兵步行接力，“遍布冲僻各处”。^㉕

井陘道为平定州与井陘县东西铺路所在，间隔10至15里置一铺站，各设铺兵2至6名不等，“于附近有丁力粮近一石之上、二石之下者点充正身，与免杂泛差役，专递文报”。^㉖明代井陘道共设急递铺27处，分别位于获鹿县土门口、胡神、平望^㉗；井陘县固底、赵村、横涧、凤山、县治、朱村、板桥、长生口、龙窝、核桃园；平定州甘桃口、槐树铺、固驿铺、柏井、小桥铺、西郊、磐石、州治、义井、平潭、赛鱼、新兴、测石、新店等沿线村落。^㉘万历四十六年，为缩短路程，井陘知县罗懋汤将北段铺路改设为南段，胡神至凤山段6铺裁撤，改设下安、上安、王家庄、微水、横口、西河6铺。^㉙

清代铺站总数未变，其变动主要在于平定州段。除个别铺站易名外^㉚，由于柏井镇西5里青玉峡路段崎岖难行，故于此地增设石川会铺。迤西铺站也随之整体调整，并在石门口、义东沟、小阳泉、石卜嘴、旧街等地次第新置，裁撤义井铺、平潭铺、赛鱼铺、汉桥铺。^㉛

3. 塘站的新置

清代以来，井陘道又增置了新的通信机构——塘站。不同于“重事”和“常事”，塘站主要是“在京城与各省督抚驻地之间的文报传递系统”。^㉜由各省推荐驻京提塘咨送兵部，隶属于兵部捷报处，负责邸报以及本省与各部院的来往，领送颁给各省官员的敕书、州县印信等。井陘道塘站体系形成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自山西省塘起，经狄村、甄井、龙白、要罗、王强、黄门、芹泉等站入境，依次西行30里测石站，30里平潭站，30里磐石站，30里桥头站，30里固驿站，25里旧关站，25里板桥站，以上7站均系步拨，雇募民兵接递。此后30里至横口站，50里至获鹿站出境为马拔，每站各有塘马4匹。^㉝

(二)运输机构的裁并

递运所，是明代运递官方物资及军需的运输机构^㉞，“掌运递粮物，洪武九年(1376)始置”。^㉟据成化《山西通志》载，洪武初年井陘道上设有井陘和平定两处递运所，分别位于井陘县治内与平定州城外东关长乐坊，间隔130里。^㊱又据《明宣宗实录》记录，宣

德二年(1427),为避免陕西“凡诸有司及西番酋长贡献经过”时递送迟误,“设寿阳、平定、井陘三递运所”。^⑧这种看似矛盾的记载,可能与明代递运所“先天不足”,裁置反复有关。递运所设置于运输繁重之处,路线与驿道多有重合,数量又远少于驿站,使其难以长期独立承担大型运输任务,明中叶以后被大规模裁汰。井陘与平定递运所相继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万历六年(1578)被裁革^⑨,相关业务由驿站承担。

(三)治安机构的强化

在确保通信与运输稳定的同时,维系治安安也是明清时期井陘道管理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巡检司作为明清地方基层的治安机构,属州县管辖。其“巡检、副巡检,俱从九品,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⑩明代井陘道设有故关巡检司,位于旧关村,洪武三年置。^⑪正统二年(1437)新筑故关城后,于来年复置巡检司。^⑫清代以来,为进一步强化驿道治安环境,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甘桃、柏井、测石三地驿丞奉文兼巡检事。^⑬

此外,朝廷往往也“相都邑之冲会,山川之险要,设戍置兵,立之将帅,授之节制,以绥靖嘉师,控驭遐裔”。^⑭明代地方镇戍实行卫所制,“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⑮井陘道东部及固关、娘子关两地,隶属直隶真定卫,嘉靖二十二年(1543)添设固关参将,“驻扎井陘,所统真、神二卫官军轮班操守”。^⑯西部设平定州守御千户所,“在州城内,洪武二十四年(1391)建,隶山西都司;永乐十七年(1419)改隶直隶后军都督府”。^⑰

清代地方驻防为绿营制,营制分标、协、营、汛4种,由汉人充任;兵种分马、步、守3种。各营分领汛地,按段设置墩、堡、寨、台等基层组织,“以控制险要,令各分而守之”^⑱,主要负责缉捕要案、防守驿道、护卫行人、稽查匪类等防汛任务。^⑲井陘道东部设固关营,驻固关,分领井陘汛、桃园汛、娘子关汛以及赞皇县固关属王家坪汛4处汛地。^⑳又于汛地沿线邵家庄、下安、王家庄、微水、长岗、横口、南关、长生口、核桃园等村设置墩台9座,各设守兵5名。^㉑井陘道西

部于康熙六年(1667)设孟寿营,驻孟县,属太原镇,先后统辖平定、孟县、寿阳、乐平各处营汛。^㉒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从山西巡抚英桂所请,升平定汛为营^㉓,下辖分汛20处,其中井陘道沿线置18处,包括旧关、槐树铺、固驿铺、柏木井、八里桥、柏井、桥头、石门口、西郊、藁石、南天门、义井镇、平潭、赛鱼、新兴、坡头、测石、新店等分汛,每处设守兵5名。^㉔此外,遇有战事,朝廷还会调遣军队驻守。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抵御八国联军入晋,清廷调遣大同镇总兵刘光才等统帅营部人马驻防井陘道,“择地筑垒,以自守御”。^㉕

综上,井陘道的交通机构经过明清以来的不断调整,陘道沿线诸村形成了一套军事与行政并行的交通管理体系,包括以驿站、铺站和塘站为主的通信系统,以递运所和驿站为主的运输系统,以及以巡检司和营汛为主的治安系统,为时人穿越太行山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三、井陘道交通秩序的规范

井陘道深受军事因素影响,时而畅通,时而闭塞。^㉖中古以来北方动荡不断,井陘道“经五季之乱、金宋之兵焚”^㉗,民众四处离散。在元末连州县治所都沦为“坠废之城,荆榛之土,驰阳无及污,传舍无停庖,殍殍之民仅存百十”。^㉘因此其通行条件也长期难以保障。明清时期,“天下承平已久”^㉙,陘道区域的交通秩序实现了由无序向规范的转换,推动了陘道交通环境的改善。

(一)道路治理的常态化

随着井陘道地位的不断提升,疏通道路也成为明清时期地方官员的重要政绩。光绪《山西通志·名宦录》中就收录了平定州王世铤、瑞亨、宣麟等多位有路政善举的地方治宰。^㉚官方治路以交通干道为主。如嘉靖十五年(1536),娘子关守口武德将军李公荣修治井陘道西路北段百花山栈道,“修道复坦平,然大易于前时也”。^㉛驿道更是修治重点,如井陘县“大路每年二月、九月各修一次,如有大工,则募款修治”。^㉜乾隆四十九年(1784),平定州牧瑞亨“修固关、石川会、南天门诸坡险路,以利行人”。^㉝嘉庆十六年(1811),平定知州吴安祖重修南天门驿道,“不费官帑,不烦胥吏,而化险为夷,行道兑矣”。^㉞光绪七年

(1881),山西巡抚卫荣光奏请兴修四天门,“工程自晋省榆次县什贴镇起,至直隶获鹿县土门口止,由晋独力认办”,规模为历代官修之最,治后陞道“一律坦荡,冠盖往来,任载络绎车驼,无倾踣之虞,人畜免漂溺之患”。^⑭官府修道往往规模大,路线长,影响深远,具有全局性与周期性,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井陘道不仅是官方来往的驿道,也是沿线村民赖以生活的乡道。村众时常自修乡道,“较之他处更为急办”。^⑮傍水各村道路汛期易受河水冲坏,时需修治。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井陘县长岗村南河头大路被河水冲坏数十丈,车马无路可行,乡民“募化四乡君子与本村善人共捐资财,修顺水石墙一堵,功已告竣,而车马行人终可以无阻矣”。^⑯而倚山诸镇道路窄狭,常有坠崖之虞。井陘县下安村东仰字岭上设有驿道,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年久日远,路坏栏倾。乡人刘正募集乡众,“择日兴功,宜开者开,宜修者修,越半载而功告成,由是往来行人,虽黑夜亦无坠崖之害”。^⑰乡里修路注重时效性,但多受限于属地观念、财力经费等因素,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

井陘道的通道属性,还使行旅成为治路的又一社会力量。既有来往陞道的士绅望族,如弘治十六年(1503),太原士绅朱清“兴起恒心,发其善念,自井陘县长生口累路修起,至本村(柏木井)西”。^⑱嘉庆十九年(1814)平定州阳泉名士张钺倡修井陘县驿道,“自岭而东,划削梗塞,以巨石甃砌,坚整若棋局然。附近百里内外,凡萃确难行处,一一平治,罔弗整且坚”。^⑲也有穿行商道的行商大贾,如汾州府介休张良村商人宋廷英,来往陞道近四十年,每叹行路之艰,于嘉庆三年(1798)捐银一千二百两治道,“自西天门起,至于旧关关坡界牌,凡延袤四十八里有奇,越二百四十日工竣”。^⑳还有星驰驿道的使节廷臣,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率兵途经井陘道时,“见石路损坏,捐银六百五十金”^㉑,先凿南天门一径;光绪七年,又“筹发三万金,次第修治”^㉒余段。不同身份的行旅者在井陘道的修治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过往官员凭借其权势,对当地官府提高修路效率起到一定督促作用;商贾慷慨解囊为当地百姓修路提供了经费支持;名士的义举以及凭借自身名望进行宣传与

募捐,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道路的修治。但此类修缮均属临时性质,不具备持续效能。

明清时期,由官方、乡里与行者构成的三种修路力量,客观上促成了井陘道交通修治的常态化,在有效互补各自局限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陞道路面的通畅。

(二)道路质量的提升

井陘道常态化的修治运动,带动了沿线道路质量的提升,“或专用石工,或镶以石礪,或护以拦马墙,山峻者堑岩划壁,以益其宽;岸狭者培土累石,以增其厚。道旁开渠,以泄横流,随处作桥,以通车马”。^㉓以关阁、桥梁、津渡、堤坝为代表的交通设施在陞道各处普遍出现。

关阁是一种在地理冲要之处竖筑台基,上搭亭廊,下券拱洞的石质建筑。其在区域动荡环境里是防堵兵燹的屏障堡垒,而在承平时世便成为行旅车马“聊足以供往来之观瞻”^㉔的交通景观。明清是井陘道关阁的集中建造期,根据笔者田野调查与文献统计,该时期仅干道沿线区域就新筑关城3处,分别是修筑于正统二年的故关、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娘子关、嘉靖二十二年的固关^㉕;此外还至少创修乡阁168处,其中位于村内159处^㉖,村外山岭9处,以建于井陘县白石岭脊的关帝阁、平定州故关岭脊的全神阁、柏井驿分水岭脊的四圣阁、平定州城西黑砂岭脊的凭虚阁为代表,并称为井陘山道的“四大天门”。^㉗可见,明清时期的井陘道上,“凡乡村巨镇,村口具有杰阁”。^㉘而阁道作为其必备的基础设施,也在关阁创修浪潮中得到普遍修治。一些村中阁道“以平堑者,以补圯者”,使“徒步而来者,履道之坦坦;驾车以至者,歌驱之悠悠”^㉙;山岭阁道“随势开凿,皆砌以石”^㉚,“又为石阑,以防颠越”^㉛,使涉岭行者“上者有所驻足,以节人马之力;下者有所稽顿,以杜僂轹之辙”。^㉜

桥梁是古人跨河越涧的重要交通设施。井陘道所经山脉蜿蜒、河水迂曲,“一日七十渡,石齿何丁丁”^㉝是来往井陘道的生动写照。明清以前,井陘道沿河诸乡以搭盖浮桥和褰裳涉渡为常态。^㉞固定桥梁主要建于沟大涧深的险要之处,文献记载有限,仅有创建于宋至和年间(1054-1056)的井陘县垂虹桥、

元丰八年(1085)的天威军石桥、金正隆四年(1159)的平定州永善桥、崇庆元年(1212)的大石桥等寥寥数处。^⑤明清以来陘道沿线的桥梁数量迅速增加,收录于地方志中的桥梁达到29座。^⑥桥梁类型丰富多样,干道上多石质桥梁,包括单孔的圆弧、敞肩、空腹、实腹、桃形等石桥,以及多孔的联拱圆孤石拱桥。支路则遍布木梁桥与木板桥。而在季节性的溪流小泉上,多摆放由礅石排列的踏步桥,需要行人以跳跃的方式通过,故有“紧过礅石慢过桥”的民谚之说。^⑦明清时期井陘道桥梁的发展,不仅减轻了行人的涉水之患,“无复向日危险之虞”^⑧;也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区域社会地理标识,对沿线聚落的社会整合产生了积极作用,出现了一批以“桥”为名的聚落。如平定州桥头村,有“五里七桥”之说,故而得名。^⑨

在不便修桥的河道路段,则设有津渡以利通行,“以巨木纵横水际,联绳于岸木端,施机渡舟,系绳一端,挽而过”。^⑩井陘道东部“大路之河东坡、三西河、微水诸乡,与北路之南固底、北防口、洛阳诸乡,均置有船舶,以利行人”。^⑪平定州五渡则是陘道西部的一处重要渡口,享有“五渡平波”之誉。^⑫

堤坝,是明清井陘道沿河地区又一基础设施,除了“人赖以安”^⑬的防水作用外,坚硬平坦的堤面也承担着“筑堤以利行人”^⑭的交通功能。如光绪七年官方重修井陘道时,“今自(井陘县)南关外至东坡底止,创筑石堤六段,计长五里有奇,屹若长城,永免厉揭之苦……义井至测石驿一段,滩路纡迴,涉水者凡十二处,夏秋亦苦山水之患,令于平潭、石坝嘴、墩台山三处创筑石堤二里,内则因山开道,外则筑坝护堤,堤内树桑,堤外树柳,可以方轨行车”。^⑮

综上,明清时期,随着各式交通设施在沿线节点的完善,井陘道道路质量不断提升,成为四方来者“幸幽人之坦坦”^⑯的山区通途。

(三)交通支应的多元化

明清以来井陘道沿线区域形成了以驿站、店铺和寺庙为主体的三类支应形式。

驿站不仅是明清时期官方重要的通信机构,还是交通支应的核心组织。井陘道地居冲繁,接差与送差事宜悉由沿线各驿承办,公差一到,“凡尖站、宿站之所拉轿之牵夫、溜马之马夫、帮抬之轿夫、更夫、

火夫、铡草夫、打扫夫、灯笼夫、挑水夫;车也、马也、骡也、锅炉也;帷布、芦席、绳索也;猪、鸡、酒、米、油、盐、酱、醋、柴、炭,无一不备”。^⑰如咸丰五年(1855)七月,李鸿藻在赴任山西乡试主考途中,陘山驿不仅组织应差轿夫,还派民壮二人在险要路段护送。李于甘桃驿换乘驿马后,入山西平定州境,抵柏井驿公馆宿,“自此处每轿皆有兵勇四人护送,轿前添红伞一柄,巡捕乘骑前行,沿途持帖回事,皆伊等伺候”。^⑱而遇有紧要大差或杂差,驿站不敷供给时,则多“借资民力”。^⑲如陘山驿“当遇非常差使,又有杂差,各庄日行人驴、夫役,只应杂差使用。又况号马不足支用,有帮槽马不足支用,有杂差役夫驴,随县尊钧票传用”。^⑳另一种方式是通过“邻封之协济”^㉑,多用于过境兵差。如乾隆十四年(1749),经略公傅恒平定金川叛乱凯旋时,柏井驿与甘桃驿奉调辽州、和顺县、榆社县、忻州、崞县,以及平定州、乐平县自雇车马,共计用车100辆,马骡1089匹。^㉒

店铺,则是民间支应的核心保障。明清时期随着井陘道交通的繁荣,出现了诸多为来往行旅提供尖宿服务的村镇,在一份清代重庆府至京都的行路规程中有详细记述:

……至义井镇,涉水有七十二渡,有店,尖、宿均可……义井镇十里,坡路,有店可尖……桥头十里,石路滑难走,车行屡坠,有大店,尖、宿均可……柏木井八里,有店可尖……界牌五里,平定州、正定府交界,直隶井陘县属,有店可尖……长生镇五里,有大店,尖、宿均可,俱石路。板桥五里,有店可尖……东窑岭五里,坡下有河,即窑子,过河,冬桥夏渡,可尖……微水铺五里,石路,河二道,冬桥夏渡,井陘属,有店可尖……^㉓

此外,还涌现出如井陘县北张村驼市这样的专业性集镇,“沿道村驿驼店甚多,在骆驼通行频纷之地,不可缺也”。^㉔同时,以陘道为中心的商业空间也迅速扩展,“街市尤闹热”^㉕,各类商业店铺不断增加。以平定州城为例,嘉庆九年(1804)的一通布施碑上共记录城内各街商号65家,包括当铺、钱铺、旅店、饭店、糕店、车马店、驼店、药店等。^㉖多样的行业店铺为来往行旅提供了丰富的商业服务,基本满足了后者的各类需求。

庙宇,是民间支应的一种重要补充。明清时期为井陘道区域庙宇创修的高峰期,“其间僧室道院争奇竞胜于深岩林泉之中者,不可枚笔”。^⑥井陘道不仅途经人烟凑集的聚落,还穿越险峻荒芜的山岭,如青石岭、凤凰岭、白石岭、门限岭、黑砂岭等处。“小民推车肩挑过岭者,登巅涉坂,奔驰于嵌崟坎壈,乱石嵒岬,汗沾于背,烟出于口,仰视红日在天,铄石流金”。^⑦临近孔道的庙宇成为交通支应的重要力量,不仅创建凉亭,供行者“游乐休憩,畅叙幽情”,^⑧而寺院本身也成为“往来商客暑月乘凉,冬日回暖”^⑨之地,“服贾牵车可借此而适体,担夫贩笠亦依之以息肩”。^⑩其搭设茶棚,“煎茶供客,终日执瓯杓而俟于山门结缘者”^⑪,逐渐发展为一种地方风尚,不仅为荒岭行旅提供了便利,寺院也在这种交通互动中建立起与世俗民众的广泛联系,保障了香火的延续。

随着沿线交通秩序逐步规范,明清井陘道的交通效率也得以提升。在通行方面,驿道日程为80至100里不等,与日程100里以上的平原驿道差距缩小,只在20里上下^⑫;而在通信方面,二者程限已无明显差异,均“按日行六百里计”。^⑬

四、结语

明清时期是我国山区交通建设的重要阶段。通过本文分析可知,这一时期以井陘道为代表的太行山区交通也迎来迅速发展,集中体现在区域交通线路的完善、交通机构的健全以及交通秩序的规范等方面。不同于西南、华南等边疆地区在行政力量主导下的以驿道为中心实现地域认同的国家政治性建设^⑭,拱卫京畿的太行山区交通建设则在多元要素的共同影响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功能性特征。其中,山地环境的特点决定了交通建设的方向,形成了沿河谷集聚的道路网络、机构设置与聚落分布;政治格局的变化推动了交通建设的进程,促进了道路网络的完善、机构系统的健全与交通秩序的规范;而区域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交通建设的成果,官方机构、民间组织与宗教团体等各类群体融入到交通秩序的构建之中,共同推动了区域交通秩序规范的形成。在上述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交通建设愈发成为明清太行山区域整合的重要动力。各陉道也早已经超越作为通行载体的静态形式,被不断附加丰富的

社会特征。以陉道为空间载体,将区域各要素有机统一的华北山区腹地型交通功能区在太行山陉道沿线逐渐形成。

注释:

①《述征记》载:“燕赵间,凡厥山路名之曰陉。”参见〔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53《地部十八·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9页。

②〔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61《河北道·镇州·井陘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52页。民国《井陘县志料》载:“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陉,故谓之井陘。”参见民国《井陘县志料》第1编《疆域·沿革》,《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6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9页。

③光绪《平定州志》卷11《艺文志·上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2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④〔清〕徐继畲:《条陈山西防守事宜致王雁汀中丞》,《松龛先生奏疏》卷下,民国三年影印本,第36页。

⑤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河北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第1441页。

⑥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20《兵部·车架清吏司·邮政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85年,第612页。

⑦明清太行山交通线路的研究,主要有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张宪功:《明清山西交通地理研究——以驿道、铺路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李嘎:《古道悠悠:明清民国时期的晋城交通与沿线聚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河北区》。明清太行山交通特点的研究,主要有王尚义:《历史流域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张祖群:《新文化地理学:点、线、面维度的文化管理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明清太行山交通功能的研究,政治方面主要有罗士洞:《村道太行:文化转型视野下的华北山区乡村治理与再造》,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军事方面主要有李广洁:《山河形胜:山西历史军事地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经济方面主要有杨波、何慕:《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往来北京商路研究》,《保定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⑧蓝勇:《近70年来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3辑,第14页。

⑨当前成果主要以新编地方交通志为主,如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省志·交通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21卷《交通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井陘县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井陘县交通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⑩周大鸣:《道路研究的意义与途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6页;周永明:《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的生产、使用与消费》,《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第14页。

⑪〔清〕朱书:《燕秦之道》,《朱书集》卷10《杂著·游历记》,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33页。

⑫〔清〕张钺:《募修白石岭路引》(嘉庆十九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⑬民国《平定县志》序《河道图说》,民国十一年影印本,第2页。

⑭根据清代及民国方志统计,井陘道东部井陘县聚落由清初雍正时的192村增至光绪时的264村;西部平定州聚落明万历时为175村,清乾隆时为203村,光绪时增至288村。参见雍正《井陘县志》卷2《建置志·庄村》,《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0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95-104页;光绪《续修井陘县志》卷10《庄村》,《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0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5页;乾隆《平定州志》卷3《舆地志·都村》,乾隆五十二年刻本,第53页;民国《平定县志》卷10《疆域略》,第13页。

⑮〔元〕虞集:《都漕运副使张公墓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892《虞集·七九》,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532页。

⑯〔明〕韩文黄:《威州镇修复石桥碑铭》(万历二十一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59页。

⑰〔明〕王广德:《大明国直隶真定府井陘县重修通济桥碑记》(成化十四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41页。

⑱雍正《井陘县志》卷2《建置志·铺舍》,第119页。

⑲《重修显龙观碑记》(乾隆七年),现存河北井陘县威州镇五里寺村显龙观内。

⑳〔清〕梁栋:《重修道路碑记》(光绪三十二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161页。

㉑〔清〕张钺:《募修白石岭路引》,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113页。

㉒〔清〕马有威:《横涧西村重修古龙泉寺碑记》(同治六年),政协石家庄市井陘矿区委员会编:《井陘矿区历史文化·金石碑刻》,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446-448页。

㉓〔清〕许高伟:《重修钟楼西庙南楼记》(雍正三年),现存

山西平定县娘子关镇娘子关城关帝庙。

㉔光绪《平定州志》卷16《杂志·古迹》,第569-570页。

㉕〔清〕董天仁:《重修关帝庙财神阁暨大王庙乐楼碑记》(同治二年),现存山西平定县娘子关镇坡底村关帝庙。

㉖〔明〕王都:《碧天洞新建藏山大王行祠记》(嘉靖四十三年),李铭魁主编:《平定文史资料》第14辑《平定碑刻文选》,内部印刷,2001年,第169页。

㉗〔明〕武文:《重修道路并建观音堂记》(成化二十三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43页。

㉘无题名修路碑(道光二十五年),现存山西平定县娘子关镇娘子关村真武观音阁。

㉙〔清〕贾联元:无题名诉讼碑(光绪九年),现存山西平定县娘子关镇河北村。

㉚道光二十五年刊立于娘子关的一通修路碑反映了来往此路四方驼客的地域范围,包括归化城、张家口、河堡营、太原府、宣化府、汾州府、济南府、大同府、平定州、获鹿县、河南、陕西、兰州、凉州、忻州、并州、交城、孟县、祁县、汾阳、寿阳等地。参见无题名修路碑,现存山西平定县娘子关镇娘子关村真武观音阁。

㉛〔清〕刘逢年:《更修山门碑记》(乾隆三十五年),现存山西平定县巨城镇圪套村昭济庙。

㉜光绪《平定州志》卷16《杂志·古迹》,第570页。

㉝〔后唐〕王斌:《封白鸡山记》(天祐十年),现存山西平定县巨城镇龙庄村白鸡祠内。

㉞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河北区》,第1442页。此外,根据笔者对沿线文物的调查与统计,中段魏晋唐宋时期的寺庙、石窟、碑刻等遗产合计30处,明显多于北段的10处与南段的11处,一定程度支持了该论断的合理性。

㉟〔清〕潘兆麟:《新建官房官窑并戏楼碑记》(乾隆五十一年),现存山西阳泉市郊区下五渡村官房。

㊱〔清〕周进谋:《增修石堤记》(光绪二十三年),现存山西阳泉郊区白羊墅村委会。

㊲《重修观音阁记》(万历四十七年),现存山西阳泉平定县娘子关镇程家村观音阁;《重修财神晋阳阁碑记》(刊立时间待考),现存山西阳泉平定县娘子关镇程家村晋阳阁。

㊳无题名布施碑(道光三年),现存山西平定县娘子关镇程家庄村。

㊴靳生禾、谢鸿喜:《汉赵井陘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2-6页。

㊵〔宋〕张山:《重修驿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5册卷2706,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㊶〔金〕赵秉文:《涌云楼记》(大安二年),光绪《平定州志》卷10《艺文志·上一》,第365页。

⑫〔清〕夏坤：《钦依镇守固关等房地方守府王公重修庙宇碑记》（康熙十三年），现存山西平定县娘子关镇新关村西峰寺。

⑬〔清〕杨瑜：《重修石堂寺记》（乾隆六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375页。

⑭〔清〕吴焘：《游蜀日记》，葛剑雄、傅林祥主编：《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89页。

⑮〔清〕刘文炳：《柏井镇分水岭金装菩萨神像碑记》（乾隆三十五年），现存山西平定县柏井镇柏井一村四圣阁。

⑯〔清〕张之洞：《修理直晋各工完竣疏》，〔清〕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8《工政一》，光绪年间石印本，第1718页。

⑰民国《井陘县志料》第2编《地理·交通》，第109页。

⑱《井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井陘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5-126页。

⑲《井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井陘县志》，第127页。

⑳〔清〕卢居广：《无题名规约碑（同治八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590页。

㉑威州川为井陘县境开发较早区域。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沿线聚落周边发现诸多先秦至宋元时期的遗址与遗存。参见井陘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编：《发现井陘：井陘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14年。

㉒《井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井陘县志》，第131-134页。

㉓《井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井陘县志》，第129页。

㉔《井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井陘县志》，第130页。

㉕光绪《平定州志》卷3《建置志·驿铺》，第94页。

㉖〔清〕阎奋鹏：《重修古道碑记》（光绪十五年），现存山西阳泉市河底镇苏家泉村。

㉗光绪《平定州志》卷2《舆地志·都村》，第57-58页。

㉘〔明〕白鑑：《创建祈报祠记》（正德十四年），现存山西阳泉市荫营镇下白泉村祈报祠。

㉙〔清〕阎达：《寨沟凿井碑记》（道光十九年），现存山西阳泉市荫营镇下白泉村。

㉚光绪《平定州志》卷2《舆地志·都村》，第58页。

㉛光绪《平定州志》卷3《建置志·驿铺》，第94页。

㉜光绪《平定州志》卷2《舆地志·都村》，第56-57页。

㉝王智庆、李存华：《晋东商业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㉞光绪《平定州志》卷16《杂志·古迹》，第569页。

㉟〔明〕张凤翼：《兵部尚书张凤翼等为晋寇流近井陘等事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㊱光绪《平定州志》卷2《舆地志·都村》，第57页。

㊲〔清〕张文熙：《无题名布施碑（康熙三十年）》，现存山西平定县东回镇木槽村全神庙。

㊳张得旺：《乐楼碑记》（民国十九年），现存山西平定县东回镇木槽村苍岩圣母庙。

㊴〔清〕张纯厚：《重序水池碑记》（道光二十七年），现存山西平定县东回镇木槽村苍岩圣母庙。

㊵光绪《平定州志》卷2《舆地志·都村》，第56-57页。

㊶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21《兵部·车架清吏司·邮政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3册，第612页。

㊷〔清〕曾国荃：《办理晋省善后就绪疏》，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56页。

㊸《明史》卷75《志第五十一·职官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52页。

㊹〔清〕黄六鸿：《论驿政》，〔清〕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卷73《兵政四·马政》，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15页。

㊺嘉靖《真定府志》卷11《建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二十八年刻本，第11页。

㊻成化《山西通志》载“洪武二十二年及永乐九年建”。张宪功结合永乐《太原府志》进行考证，推断至迟在洪武十三年（1381）柏井驿已设置。参见张宪功：《〈明代驿站考〉山西驿站补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4辑，第65页。

㊼洪武年间隶属平定州，至景泰九年前改隶乐平县。参见张宪功：《〈明代驿站考〉山西驿站补正》，第65页。

㊽〔明〕汪应蛟：《议裁冗设通酌济以少苏畿南驿困疏》，《抚畿奏疏》卷5，明刻本，第2页。

㊾成化《山西通志》卷4《驿递》，成化二十一年刻本，第30页。

㊿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驿铺》，第91页。

①成化《山西通志》卷4《驿递》，第30页。

②张宪功：《〈明代驿站考〉山西驿站补正》，第64页。

③雍正《井陘县志》卷4《政事志·驿站》，第192页。

④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驿铺》，第91-96页。

⑤光绪《广州府志》卷134《列传二十三》，光绪五年刊本，第24页。

⑥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驿铺》，第92页。

⑦光绪《孟县志》卷8《建置考·驿递》，《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2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⑧〔清〕钟文英：《陞山驿增马详文》，雍正《井陘县志》卷8《艺文志》，第432页。

⑨〔清〕张廷玉：《为遵旨议奏自京至金川安设驿站事》，仇润喜、刘广生主编：《中国邮驿史料》，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⑩民国《昔阳县志》卷2《驿铺》，民国四年石印本，第25页。

⑪《清高宗实录》卷480,乾隆二十年正月癸未,《清实录》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9页。

⑫〔清〕黄六鸿:《设腰站议》,〔清〕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卷73《兵政四·马政》,第117页。

⑬光绪《正定县志》卷24《驿站》,《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⑭《大明律集解附例》卷17《兵律·邮驿》,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光绪三十四年重刻本,第15页。

⑮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0页。

⑯光绪《晋政辑要》卷32《兵制·驿费》,《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70页。

⑰嘉靖《获鹿县志》卷3《建置·邮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三十五年刻本,第9页。

⑱嘉靖《真定府志》卷11《建置》,第38页;成化《山西通志》卷4《驿递·铺舍附》,第39页。

⑲雍正《井陘县志》卷2《建置志·铺舍》,第119页。

⑳设于甘桃口村的“甘桃铺”更名为“旧关铺”、槐树铺村的“槐树铺”更名为“大湾铺”、固驿铺村的“固驿铺”更名为“火龙冈铺”、柏井镇的“柏井铺”更名为“五里铺”、西郊的“西交铺”更名为“五里铺”、藁石的“藁石铺”更名为“凤居口铺”、兴新镇的“辛兴铺”更名为“浅水淤铺”、测石的“测石铺”更名为“安铺”。参见民国《昔阳县志》卷2《驿铺》,第26页。

㉑同治《畿辅通志》卷125《经政略·兵制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年刻本,第22页;光绪《平定州志》卷3《建置志·驿铺》,第94页。

㉒刘文鹏:《清代提塘考》,《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88页。

㉓光绪《山西通志》卷80《略七之二·公署略下·驿传》,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3735页。

㉔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修订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第458页。

㉕《明史》卷75《志第五十一·职官四》,第1853页。

㉖成化《山西通志》卷4《驿递》,第33页。

㉗《明宣宗实录》卷31,宣德二年九月丙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803页。

㉘万历《大明会典》卷147《兵部三十·驿递二·递运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十五年刻本,第2、6页。

㉙《明史》卷75《志第五十一·职官四》,第1852页。

㉚万历《山西通志》卷24《武备上·边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崇祯二年刻本,第62页。

㉛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城池·附关梁》,第62页。

㉜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驿铺》,第91-97页。

㉝乾隆《大清会典》卷63《兵部·职方清吏司·营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27页。

㉞《明史》卷76《志第五十一·职官四》,第1874-1875页。

㉟〔明〕王士翘:《西关志·故关卷》卷10《沿革》,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3页。

㊱成化《山西通志》卷4《宗藩》,第14页。

㊲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3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64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635页。

㊳罗尔纲:《绿营兵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3-266页。

㊴同治《畿辅通志》卷121《经政略·兵制三》,第52页。

㊵光绪《获鹿县志》卷9《兵防·墩堡》,《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乾隆《正定府志》卷109《武备中·墩汛》,《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08页。

㊶康熙四十二年(1703)该营移驻平定州,雍正三年(1725)复归旧址。参见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营制》,第80页。

㊷《清穆宗实录》卷102,咸丰十一年十二月癸亥,《清实录》第47册,第1644页。

㊸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营制》,第81页。

㊹〔清〕李永钦:《赵守将白面将军陈余墓碑记》(光绪二十七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155页。

㊺如秦二世二年(前208)末,赵王武臣命令李良攻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汉王三年(前204),韩信、张耳率军三万伐赵,重开井陘道;北魏登国元年(386),冠军将军于栗磾引兵讨伐后燕慕容宝,“潜自太原,从韩信故道开井陘路”。参见《汉书》卷32《张耳陈余传第二·陈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35页;《汉书》卷34《韩彭英卢吴传第四·韩信》,第1867页;《魏书》卷31《列传第十九·于栗磾》,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5页。

㊻〔元〕丁黻:《重修仙台山护国院碑记》(至元十七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203页。

㊼〔元〕王□:《井陘县守御官脱公德政碑》(至正二十七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38-39页。

㊽〔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

㊾光绪《山西通志》卷110《录一之十·名宦录十·守令》,第5099-5100页;光绪《山西通志》卷111《录一之十一·名宦录十一·守令》,第5114页。

㊿〔明〕王揖:《平治百花道路记》(嘉靖十五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59页。

⑬民国《井陘县志料》第2编《地理·交通》,第108页。

⑫光绪《山西通志》卷110《录一之十·名宦录十·守令》，第5100页。

⑬〔清〕铁保：《南天门修石路记》，光绪《平定州志》卷12《艺文志中》，第444页。

⑭〔清〕张之洞：《修理直晋各工完竣疏》，〔清〕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8《工政一》，第1719页。

⑮〔清〕梁治盛：《方便巷修路石记》（嘉庆五年），现存河北井陘县天桥镇桃园村井龙王庙。

⑯《修路碑记》（咸丰元年），现存河北井陘县微水镇南河头村关帝阁。

⑰〔清〕梁栋：《重修道碑》（光绪三十二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161页。

⑱〔明〕蔡芳述：《平定州柏木井重修闫王殿记》（弘治十六年），现存山西平定县柏井镇柏木井村石佛寺。

⑲〔清〕那彦成：《平定州东路修治石道碑记》（嘉庆十九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116页。

⑳〔清〕宋大宾：《捐修道路碑记》（嘉庆三年），现存山西平定县柏井镇柏井一村四圣阁。

㉑光绪《平定州志》卷3《建置志·城池》，第62页。

㉒〔清〕左宗棠：《答杨石泉书》，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661页。

㉓〔清〕张之洞：《修理直晋各工完竣疏》，〔清〕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8《工政一》，第1718页。

㉔〔清〕李国珍：《重修文昌阁碑记》（道光二十六年），现存河北井陘县秀林镇横口村文昌阁。

㉕其与该区域原有的土门关、白皮关等古关城，共同构成了明清井陘道区域的关防核心体系。参见《井陘县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井陘县交通志》，第228页。

㉖根据其在村中的不同位置，又分为149处界阁和10处过街阁。

㉗白眉初主编：《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卷2《山西省志》，民国十四年影印本，第63-64页。

㉘〔清〕史三槐：《重修乐楼官窑碑记》（光绪十九年），现存山西阳泉市郊区平定镇桃林沟村慈悲庵。

㉙〔清〕刘向善：《修道碑记》（道光二十一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125页。

㉚光绪《山西通志》卷110《录一之十·名宦录十·守令》，第5099页。

㉛〔清〕王继兰：《重修阳坂坡记》，光绪《平定州志》卷12《艺文志中》，第446页。

㉜〔清〕葛士达：《重修平定州南天门坡路记》，光绪《平定州志补》卷10《艺文》，第599页。

㉝〔清〕吴雯：《送赵伸符编修使山右》，李雪梅等点校：《吴

雯集》卷4，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

㉞民国《井陘县志料》第2编《地理·交通》，第111页。

㉟〔清〕马宜之：《大宋成德军天威军石桥记》（元丰八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73页；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附关梁》，第63页。

㊱代表性的桥梁既包括如弘治年间平定州牧吴贤修建的济川桥、乾隆四十五年（1780）井陘县修建的城关十二孔联拱大石桥这种官修桥梁；也有像正德十四年（1519）高阳县行客宋玉募修的龙窝村龙山桥和嘉靖三十年（1551）柏井镇民卢九昌修建的八叠坂桥与石泉会桥这类民修桥梁。参见雍正《井陘县志》卷2《建置志·桥梁》，第113-116页；光绪《续修井陘县志》卷11《桥梁》，第47-48页；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附关梁》，第63页；《龙山桥记》（正德十四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687页。此外，根据笔者田野调查发现，在方志收录之外，陘道沿线至少还有明清桥梁40座以上。

㊲《井陘县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井陘县交通志》，第161页。

㊳光绪《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附关梁》，第63页。

㊴〔清〕黄翼堂：《重修铁梁桥记》（嘉庆九年），现存山西平定县石门口乡桥头村。类似情况还有平定州小桥村、井陘县石桥头村、板桥村等。

㊵〔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葛剑雄、傅林祥主编：《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第639页。

㊶民国《井陘县志料》第2编《地理·交通》，第111页。

㊷成化《山西通志》卷2《形胜》，第42页。

㊸〔清〕周进谋：《增修石堤记》（光绪二十三年），现存山西阳泉郊区白羊墅村委会。

㊹〔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葛剑雄、傅林祥主编：《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第639页。

㊺〔清〕张之洞：《修理直晋各工完竣疏》，〔清〕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8《工政一》，第1718页。

㊻〔清〕黄九龄：《重修朝阳阁碑记》（道光二年），现存山西平定县娘子关镇下董寨村朝阳阁。

㊼《铁路新说》，《申报》1893年3月7日第1版。

㊽李宗侗、刘凤翰编：《李鸿藻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41页。

㊾〔清〕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七年闰七月癸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7页。

㊿〔清〕李承先：《驿道除弊告示碑》（光绪二十四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575页。

①〔清〕黄六鸿：《论驿政》，〔清〕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卷73《兵政四·马政》，第115页。

⑫民国《昔阳县志》卷2《驿铺》，第24-25页。

⑬《清代重庆府至京都路程》，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70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06-707页。

⑭〔日〕宗方小太郎著，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

⑮〔清〕彭翼仲述，厚庵编订：《戌程载笔》，《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民国二年影印本，第20页。

⑯〔清〕黄翼堂：《重修铁梁桥记》（嘉庆九年），现存山西平定县石门口乡桥头村。

⑰〔清〕霍叔瑾：《重修显圣寺碑记》（顺治四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313页。

⑱〔明〕许时雍：《凤凰岭义茶记》（嘉靖四十五年），政协井陘县委员会编：《井陘碑石文选》，第313页。

⑲〔清〕陈执玉：《创建卧云亭记》（嘉庆七年），现存山西平定县柏井镇柏井五村。

⑳〔清〕延嵩龄：《重塑柏井镇法华寺圣像碑记》（康熙十二年），现存山西平定县柏井镇柏井四村法华寺。

㉑〔清〕刘逢年：《重修山门碑记》（乾隆三十五年），现存山西平定县巨城镇圪套村昭济庙。

㉒〔明〕霍鹏：《龙岗寺施茶碑记》（万历二十九年），政协石家庄市井陘矿区委员会编：《井陘矿区历史文化·金石碑刻》，第248页。

㉓根据时人日记、文集等文献统计，自京师皇华驿至获鹿县镇宁驿的华北平原驿道段，日程慢则行70里，快则行120里，多在90至110里之间。自获鹿县镇宁驿至榆次县鸣谦驿的太行山地驿道段，日程慢则行40里，快则行120里，多70至90里之间。参见〔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6册，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2528-2532页；〔清〕朱书：《游历记》，《朱书集》卷10《杂著·游历记》，第224-233页；〔清〕李燧撰，黄鉴晖校注：《晋游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31页；〔清〕陶澍：《蜀輶日记》，葛剑雄、傅林祥主编：《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第453-454页；〔清〕董恂：《度陇记》，葛剑雄、傅林祥主编：《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第607-625页；〔清〕文祥：《蜀轺纪程》，金毓绂主编：《辽海丛书》第4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2607-2609页；〔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葛剑雄、傅林祥主编：《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交通路线与里程分典》，第638-639页；〔清〕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民国上海蟬隐庐石印本，第633-634页；李宗侗、刘凤翰编：《李鸿藻年谱》，第35-36页。

㉔光绪《晋政辑要》卷31《兵制·邮政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3册，第593页。

㉕任雅萱：《颜神镇何以设县：明清华北山区社会的政治选择与地域认同》，《社会》2020年第4期，第112-114页。

Construction of Jingxing Road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o Ping Zhang Wei

Abstract: Traffic route construction w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along social shaping process in mountainous areas during traditional era. Jingxing Road(井陘道)is one of the Eight Roads at Taihang Mountain(太行八陉). The traffic status of Jingxing Road enhanc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ffic route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pecifically, Jingxing Road constructed along the river valley and formed a road network including five lateral roads and ten lengthways road. The number of accommodations along Jingxing road increased and formed complex system with complete hierarchy and function. Besides, the regional traffic order had been established and formed preliminary institutional system. In conclusion, the traffic functional area in the mountainous hinterland of North China formed by natural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ngxing Road; traffic route construction; social shaping